

「建筑名家口述史」丛书

# 一隅之耕

潘谷西 口述  
李海清 单踊 编

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

# 一隅之耕

潘谷西 口述 李海清 单踊 编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一隅之耕 / 潘谷西口述；李海清，单踊编。—北京：  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，2016.1  
(“建筑名家口述史”丛书)  
ISBN 978-7-112-18811-6

I. ①一… II. ①潘… ②李… ③单… III. ①建筑学—  
文集 IV. ①TU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1391号

丛书策划：易 娜

责任编辑：易 娜 刘 川

责任校对：张 颖 刘 钰

“建筑名家口述史”丛书

**一隅之耕**

潘谷西 口述 李海清 单踊 编

\*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北京西郊百万庄）

各地新华书店、建筑书店经销

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 印张：10½ 字数：138千字

2016年3月第一版 201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：36.00元

**ISBN 978-7-112-18811-6**

(27786)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寄本社退换

(邮政编码 100037)

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，以及由此形成的历史研究的学科分支。近年来，随着近、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和进步，越来越重视史料的一手性、客观性和全面性。在人文社科领域，许多优秀的史学专家已投入到对近、现代史进程中一些重要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工作中，通过深入细致地拟定访谈内容，与当事人“面对面”地访谈，经由系统整理，力求得到生动、鲜活的研究资料。但在建筑学界，似乎还没有形成风气和有效的力量。本丛书的策划和启动，正是期望改变这种现状的一种尝试。

本丛书面向老一辈建筑学者，其中大部分为继梁（思成）、刘（敦桢）、杨（廷宝）、童（寯）等第一代中国现代建筑学家以降的第二代中国建筑学人与建筑大师，他们多出生于国难当头的战乱时期，而后又经历新中国的建立与历次政治运动对建筑学科的冲击和影响，专业上多曾直接受教于第一代建筑“宗师”。如今，他们大多已晋耄耋之年，他们独特的人生际遇与学科探索之路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镜鉴意义。因此，立足于建筑文化遗产抢救的视角，通过“口述”方法收集史料与素材，为中国近、现代建筑史研究留存珍贵的第一手资料，已呈极为紧迫之势。本丛书所选取学者，以有较高学术成就和独特研究领域为主要标准，内容偏重历史与人文。

《一隅之耕》是本丛书第一辑的第二本，由李海清、单踊负责采访、整理和编著。潘谷西为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，一生从事中国建筑史与中国古典园林的教学与研究，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。

# 序

易娜女士邀我为本书写一个小序。然潘谷西先生是我的老师，学生给老师的作品写序，是一种不大合乎规矩的做法。无奈本书责任编辑易娜女士作为《建筑师》杂志副主编，平时对人一贯热情诚恳，逢《建筑师》召开编委会时，她对我更是关怀有加，照顾入微，使我久久心存感激。对于她的邀约，我应之有愧，然却之不恭，岂能一推了之。好在易娜女士告诉我，此事已与潘先生沟通过，征得了先生的同意。老师既然虚怀若谷，学生只能勉为其难了。

1955年我考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，得知系里师资有杨廷宝、刘敦桢、童寯等国内建筑界的泰斗级人物，还有一大批他们培养的优秀中青年学者，潘谷西先生就是这批年轻学者中的一名大弟子。由此，心里自然滋生出一种身入宝山的自豪感。

二年级时学“中国建筑史”，开始由刘敦桢先生主讲，后期因刘先生身体欠佳，由潘先生代课。自此，潘先生又指导课程设计，又讲课辅导，与我们有了较多的接触。潘先生的作风，课堂上严肃认真，一丝不苟；课堂下和蔼可亲，循循善诱，与学生们保持着自然而然亲密的交往。五年级下学期，我被分至建筑历史组撰写毕业论文，由刘敦桢和潘谷西两位先生任指导老师。刘先生时任系主任，兼建筑科学研究院历史室主

任及南京分室主任，因忙于系务工作和学术研究，对我的辅导仅限于审阅了我论文的详细大纲，并为我去曲阜、北京调研亲手写了几封介绍信；论文的具体写作则由潘先生指导。期间，刘先生曾为编著《苏州古典园林》一书，亲率潘谷西等众弟子赴苏州调研，我有幸身随其后聆听教诲，深感荣幸。

《苏州古典园林》是刘敦桢先生的晚年名著，是他几十年精心研究苏州园林的学术结晶。书稿早于“文革”之前即已完成，惜因对于极“左”思潮的忌惮，至1976年始交付出版，期间曲折多舛毋庸赘述。在这里我想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，《苏州古典园林》全书的主题思绪、结构脉络、图文取舍等虽系刘敦桢先生长期研究的成果，但具体成书，包括文字、线图、照片等也包含了刘先生众多弟子们的辛勤劳动。其中，潘谷西先生作为主力成员之一，所付出的心血，也是刘先生首肯的。

潘先生多才多艺，无论在教学、科研、设计、培养研究生诸多方面，都可谓成果累累，在南工建筑系（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）是相当突出的一员。他早期跟随杨廷宝先生参加过多项建筑设计，主要项目有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、北京国家图书馆新馆等。“文革”后又独自在古建文保领域开辟设计业务，主要项目有苏州瑞光塔修复设计、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庭院“明轩”设计、南京鸡鸣寺规划设计、庐山风景区规划设计、连云港云台山风景区规划设计和单体设计、安徽马鞍山采石矶风景区规划设计、南京夫子庙重建设计、合肥包拯墓园设计、常熟燕园修复设计、苏北高邮孟城驿修复设计、滁州琅琊山碧霞宫景区设计、南京雨花阁设计、南通濠滨书院设计、金坛建委大院设计等。设计项目既繁多又精彩，广获好评，突显了潘先生在风景园林和古建修复设计方面的精深造诣。这种造诣在高校教师中是十分突出的。

在科研方面，潘先生除跟随刘敦桢先生参与《苏州古典园林》编写工作外，还主编或参与编撰了《中国建筑史》（国家级推荐教材）、《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》、《中国古代建筑史（5卷集）·第4卷元明建筑》、

《曲阜孔庙建筑》、《中国美术全集·建筑编园林卷》、《江南理景艺术》等多部著作。行笔至此，我不能不表达一件我至今难以平复的痛心往事。1995年潘先生编著的《江南理景艺术》一书杀青，并将全稿寄我阅读，我深知此书的价值，申报选题细读加工后拟即发稿付印。但适逢出版社资金周转一时掣肘，无奈奉命与台湾南天书局商议协作出版，获对方同意，书稿随即寄往台湾。不料对方同时接受一批日版图书的出版任务，需限期出书，从而将《江南理景艺术》印制任务一拖再拖，眼看短期出书无望，我只得索还书稿，寄交东南大学出版社，一本好书就这样从我手上溜走了。这既是我欠潘先生的一笔账，也是我编辑生涯中一件窝囊的痛事。

要叙述潘先生的成就，还有许多话可说。然仅引上述数例，即可推其全貌。以我愚见，这样的名师大家，足以入选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行列，然而囿于不言而喻的体制弊端，本应公平的秤盘有时也会失衡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好在后继有人，建筑事业总在发展，足以使我们这些年近耄耋的人欣然前望。

王伯扬
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审，前副总编辑

《建筑师》杂志前主编

2015年5月16日

# 目录

## 序

- 一 从僻乡陋村走出来 / 1
- 二 值得回味的大学生活 / 9
- 三 教学工作，我做了些什么？ / 22
- 四 我的学术研究  
——从“父母之命”到倾情投入 / 45
- 五 建筑设计实践和教学、科研相结合之路 / 80
- 六 在南京经历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 / 132
- 七 感思 / 153
- 编辑的话 / 155

我的老家在上海浦东的南汇，今天的位置大概在南汇县城东门外约五六里路，一个很小的连名字都没有的村子里。南汇本来是个县，现在改成南汇区了。所以，我总说自己是上海乡下人。

南汇在清朝雍正年间才设县。最早是长江口冲积出来的滩地，需要筑堤造田，把堤内的沙滩改为耕地。当时有内、外两层堤，内侧是宋代修筑的范公堤，村民称之为“西护塘”；外侧是明代修筑的钦公堤，乡间称之为“东护塘”。因此，可以断定我们这块土地是在宋、明之间才生长出来的。南汇这地方以前没有城市，明朝初期为了防倭寇，在沿海一带建了一百多个军事据点，称为卫、所，一个卫下面有几个所，而所又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，一个千户所驻军五千多人，南汇就是一个千户所。所以南汇城是很规则的、方正的平面布局，是典型的军事城堡，城内是一个十字街，四面是东西南北四座城门，我小时候还看到过，城墙和城门后来拆掉了。东门外最热闹，那儿有一条公路和一条水路，水运比较发达。南汇地区最初是盐场，后来才逐渐发展农业、出现城市，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地名叫“三灶”、“六灶”或者“盐仓”，灶就是用来煮盐的，盐晒过后再用灶煮干。比如我家附近有个小镇叫“四团仓”，我上的小学地点就在“三灶码头”（图1-1，图1-2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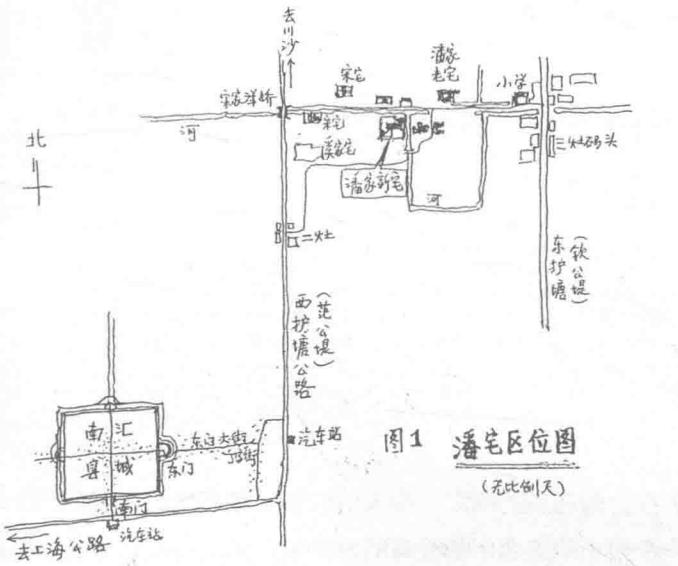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-1 潘宅区位图



图1-2 1949年潘家新宅示意图

我们那儿没有什么大户人家，世家、豪门和官宦都没有，只有一些小地主。2000年春季我回过一次老家，那里还比较落后，甚至比不上江苏的一个普通县城（图1-3，图1-4）。我家祖上可能来自河南荥阳，因为祖父在农具上写有“荥阳潘”三个字。他有120多亩田，两个儿子一分家，每家大约分得五六十亩田。我的堂兄是长孙，单独分得长孙田10亩。因为靠近上海，伯父在市里做生意，开了家布号，专营布匹批发。父亲在奉贤县一个大镇子上的一家当铺里做“管包”，也就是管仓库的，月薪大概五六石米。所以家庭虽不算富裕，但生活还算过得去。



图1-3 南江县城2000年时街景



图1-4 南江县城东运河2000年时沿岸景色

我5岁时，进了离家约一里路的三灶码头公和小学，一直到四年级。这个学校设在一座小关帝庙内，有两间教室，就在关帝像旁边。只有两位老师，一位姓潘，兼校长，一位姓陶。开设了语文、算术、珠算和图画课，学生全部走读。

父亲在我10岁时病逝，之后家里经济就比较困难了。我和妹妹上小学、初中的开销就只有靠种地和收田租，其中有20亩地是自己种的，到耕地、播种和收割时要雇短工，要请他们吃饭，还要间插着送点心给他们吃。

1938年，我10岁，正值抗日战争时期，举家逃难到上海市内，住在英租界的旅馆里。刚开始日军还没占领那儿（直至1941年底“太平洋战争”爆发，日军才占领租界），相对安全些。当时全家寄居在福建路上的一家小旅馆内，门外就是有轨电车，我们称它为“翘辫子车”，不久后又逃到浦东的周浦镇。我们和伯父两家在镇上合租了一个院落的两间房。这时伯父还在租界里开布号，他是经理，手下有学徒、跑街（推销员）、账房和送货师傅各1位，也就是5个人，规模很小，地点在广东路和延安东路之间，河南路昌兴里10号，是老式石库门住宅，木结构两层楼围成的三合院。伯父的布号租了西侧的一半，那东侧的一半及中间客堂是房东住的。伯父从厂方把布匹批发进来，然后再转批给零售商，是个很小的中间商。因为没有门市，所以靠跑街拿着样品挨家推销。

逃到周浦镇以后，我生了场大病，持续近两个月，昏迷了约一个多月。醒来的时候，看到父亲躺在床上，已过世了，头和脚边各放了一盏油灯，我只记得这个场景。我醒了，他却走了。所以我不知道父亲何时离开，也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。那场病之后，我的头发全掉了，而且发现自己的两个膝盖骨很大，都鼓出来了，因为两条腿瘦得厉害。由于生病，我休学了半年，落下了功课。之后在一位家庭教师那里读了半年，然后到上海市内福州路山东路口的江东中学，上了个半年的春季班，补习了一点课程，接着就进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。

上初中以后，家里就比较困难了，所以来只能上中华职业学校。这是伯父给我的建议，他认为我们家这个情况，上职业学校比较合适。因为五年学完，毕业后就可以直接工作养家糊口了。我是1941年入学的，读机械科，主要培养绘图员和技术员。中华职业学校是黄炎培创办的职业教育学校，他认为职业教育对中国社会、经济和工业发展很有帮助。当时该校设有机械科、土木科和商科。机械科主要学机械制图、机械原理、内燃机、水力学、投影几何，写仿宋字、罗马字等课程。后来再上大学时，别的同学都对投影几何感到头痛，称之为“头痛几何”，我却觉得很轻松，很容易。因为我在中学就学过了，而且在写字方面也打下了仿宋字的功底，那时每个星期都要写一页。此外，当时还在工厂里做过实习钳工。因为是职业学校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，中学程度的国文、英语和数学（不学高等数学，到解析几何为止）分量就轻一点（图1-5）。

那时我寄宿在伯父的店铺内，那么小的地方，有货架，还要住五个人。也没厕所，用马桶。过去的上海，每天清晨人们把马桶提出去，放在后门口，有人拉粪车，给你倒马桶，刷干净，人们再提回家。自来水龙头和水池设在厨房和前面的客厅之间的一个小天井里面，是和房东合用的。伯父是经理，有一间卧室自己住，位于二楼的南面。二楼北面有两间房，是店员的卧室。那么我睡哪儿呢？我不是他的儿子，只是他的侄子，就住阁楼上。也就是二楼坡屋顶下的空间，最高的地方有两米多一点，每天晚上都要爬木梯上去。做功课怎么办呢？账房先生在外面租房住，晚上他回家后，我在账房里学习。账房是在一楼后面用木板隔出来的小房间，我和堂兄就在账房的桌子上做作业，因为灯光昏暗，写仿宋字很费眼力，所以我上高二时就近视了。堂兄比我大三岁，高中毕业



图1-5 中学时期

以后，在浙江兴业银行当职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伯父关闭了布号，和堂兄都回农村老家去了。伯父活到九十多岁，最后在老家过世。

我就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了6年，直到考取中央大学。1946年中学毕业后，伯父介绍我到江南造船厂工作，但我没去。因为眼界开阔了，同学里好多人都要考大学，抗日战争也胜利了，当时觉得很有奔头，所以我也去考大学。但是第一次没能录取，因为我中学读的是职校，基础课学得比较浅，而且报的都是名牌大学，像上海交通大学、浙江大学等。那时考大学要到当地去考，到上海、杭州和南京去考试。我报考的是最热门的电机系，当时最吃香的专业就是电机，其次是机械。落榜之后我又在上海光华大学念了一年，当时我有好几个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都没考上大学，都去上了光华大学。学了一年的英语、国文、数学（高等数学也学了一点），还有普通物理。光华大学是私立大学，学费比较高，所以就这么熬了一年，1947年再次报考大学，报的是交通大学和中央大学，后来被中央大学录取了（图1-6）。



图1-6 1947年和同学一道来南京报考中央大学，首登灵谷塔（左为潘谷西）

我那时向往的是到大工厂里做工程师，如果当年我职校毕业后去江南造船厂，只能当一个小绘图员或者技术员。我有个表叔，是我祖母的妹妹的儿子，他在兵工厂里当工程师，在我们看来是比较厉害的，有一栋2层楼的小洋房，有没有汽车我不知道。所以我就想做一名工程师，那时候普通老百姓都认为电机、机械这个东西很先进！我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之下，谈不上有什么宏图大志，没有想过成名成家，也就想当个工程师而已。土木工程行业觉得不怎样，所以我报的都是电机和机械专业，建筑学还不是我的第一志愿，我原来不知道中央大学有建筑系，是我堂弟帮我报名时多报了一个建筑系。堂弟在中华职业学校读土木科，1947年毕业后，分配到南京市工务局（在夫子庙那里）。我后来就被录取到了中央大学建筑系。

当时报考建筑系，要加试“自在画”。“自在画”是什么呢？就是给你一个题目，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。我记得考场设在老图书馆东二楼（图1-7），阅览桌很大，一个桌子可以坐几个人。题目是一句诗：“几曲小溪泛画桡，绿杨深处见红桥”，根据它自由创作一幅画。后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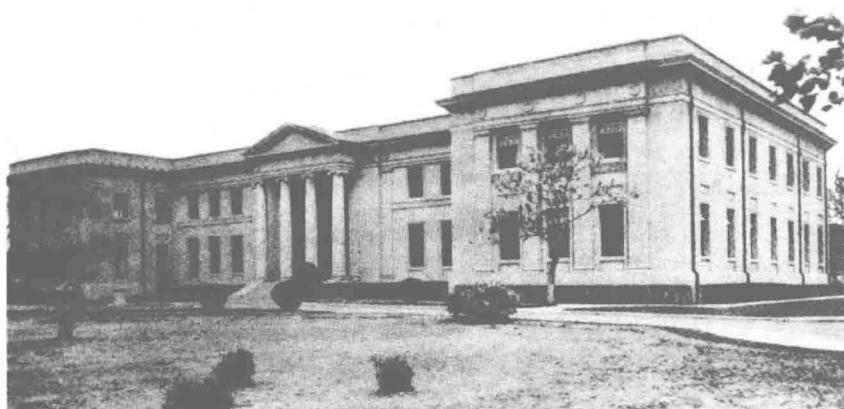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-7 中央大学图书馆外景（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老图书馆）

（图片来源：叶兆言 卢海鸣 黄强。老明信片：南京旧影）

得知，参加这次“自在画”考试的有78人，但只录取了两个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就是左濬沅。我当时坐在考场西北面的窗口，看到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带着一个年轻人走进考场，转了一大圈，然后来到我身后，停下来看了一会儿，走了。后来我想起来，那位老师就是系主任刘敦桢先生。当时我自己感觉画的还不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父亲喜欢写字画画，家里有《芥子园画谱》。我从小喜欢临摹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小桥流水什么的，很熟悉。暑假回家时常常依葫芦画瓢地临摹，我曾经用铅笔画过我祖父的一张照片，是头像，人家都说画得很好、很像——说明我当时在绘画方面还有点基础。所以我画完“自在画”后，自我感觉不错。英语考的题目叫《My family》，就是写一个小作文。国文考的是作文《后生可畏也》，就以这一句话写一篇作文。数学考的什么，我已记不清了。

小学和中学时，家里的田产靠母亲经营，经济上还算过得去。等到我上大学时，就比较困难了。怎么办呢？只好卖地，卖了大约十几亩地。因为经济拮据，妹妹初中毕业后也辍学了，高中没能上。我后来知道此事，回到家里就跟母亲讲，父亲的遗言是要尽量给两个孩子念书，这其实是听母亲说的。于是，母亲又让妹妹重新上学，在上海洋泾中学念高中，因为南汇县只有初中。到高二时，妹妹就报名参军抗美援朝了，她是复员军人。

1947年夏季，中央大学建筑系的入学考试虽然只录取了两个人，后来我们这一班却有五个同学。先说老同学姚宇澄，他原本是被录取到气象系的，但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建筑系，因为可能他数学考得比较好，被气象系抢先录取了，心有不甘啊！姚宇澄的姨父是农学院的院长，于是被请来到刘敦桢先生那里去做工作：该考生第一志愿是建筑系，却被录取到气象系了。那时候系主任是争学生的。于是刘先生亲自出面，找气象系把姚宇澄要过来了。再说甘怪同学，他比我们高一班，原本是化学系的，由于色盲，念了一年之后转系过来了。他的色盲症比较严重，所以画出来的水彩画都是灰色调的。还有一个女同学叫吴月华，她好像也是转系进来的，具体情况不太清楚。她不太爱讲话，很少和我们交流。后来因为健康原因，一年以后就休学了，到三年级下学期重新复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还是因病休学了，最终没能毕业（图2-1）。

我和左濬沅、姚宇澄经常在一起，画图、开夜车等。甘怪家在南



图2-1 1947年大学新生照